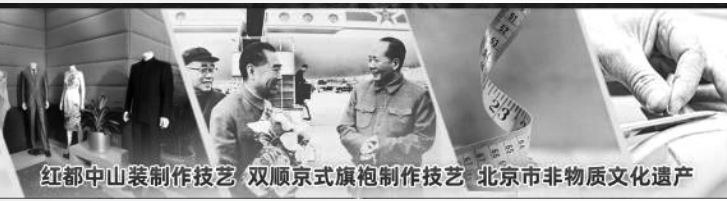


红都制衣——领导人的“红色裁缝”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东交民巷,有一家从外到内都朴实无华的服装企业办公楼,真正凸显其地位与辉煌的,是从一楼到四楼的墙上,挂满了很多国家领导人与工作人员的合影。这就是红都服装集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这里的裁剪师们曾为多位领导人制衣,几乎每个重大的历史瞬间,“红都”都曾在幕后参与其中。



“红帮”北上,支援北京城

今日的“红都”,源于历史上的“红帮”北上。“红帮”是对清末民初以来一批从事西服制作的宁波籍裁缝的统称,因其主要客户为西洋人,中国人又习惯把西洋人称作“红毛人”,所以就把这批宁波裁缝称为“红帮”。

1956 年春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一封信,对他在北京做的一套西服不太满意,改了几次都达不到他的要求。外交部派人陪他来到上海,上海市政府马上确定由享有“西装圣手”之誉的“红帮”裁缝余元芳来负责此事。余元芳仅用两天时间就改好了。小尼赫鲁试穿后表示很满意,还请余元芳为他的岳父、妻子、兄弟和儿子各做一套西装。事后,他还专门给中国外交部写了封表扬信,说他从没穿过这样漂亮、舒适的西装。

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思考。在他的协调下,以北京被服厂名义与上海市第

一商业局谈妥,抽调一些服装

名店和裁缝师高手赴京工作,以“繁荣首都服务行业”。进京后的“红都”裁缝主要有三大任务:为中央领导服务,为出国人员服务,为驻京使团服务。

私人订制,服务中南海

1956 年秋,中央又从上海招收了 12 名“红帮”裁缝,进入中南海。12 人中,田阿桐、王庭森主要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在为毛泽东设计新服装时,他们按照毛泽东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梧的特点,对传统中山装款式造型进行改进,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口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进行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样式,毛泽东穿上身后,更显伟岸挺拔。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特意穿着这件中山装拍了张半身标准像。这幅照片后来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西方媒体将这款大尖领中山装称作“毛

式中山装”。

1958 年,12 名裁缝搬出中南海,来到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继续为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制装。不光是毛泽东、周恩来,包括刘少奇、朱德以及后来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穿过“红都”做的衣服。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派人参加联合国大会。“红都”公司负责为代表团成员制作中山装、西服和大衣,得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高度赞扬。随着越来越多的外交人员走向国际舞台,“红都”也随之走向世界,得到越来越多外国人的喜爱。

角色转换,走向市场化

直到改革开放前,当时在北京只有出国人员或者凭省部级单位的介绍信才能到“红都”做一套衣服。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到“红都”门店加工服装不再需要介绍信,无论官员和普通百

姓,一律都是公司的客户。

1993 年,北京市纺织品公司、北京市劳保公司、北京市华表时装公司和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合并组建北京红都集团公司,隶属北京一商集团。新组建的红都集团在继续承担政治任务的同时,也努力向市场要效益。北京著名的涉外宾馆、饭店,如北京饭店、香山饭店、王府井饭店等十余家宾馆、饭店的礼宾服,都由“红都”设计和制作。

面对人们对服装的新需求,“红都”一方面继续发挥高端定制的特长,走精品路线;一方面继续深耕工团装市场。这项业务以为中国政府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制衣为始,一直延续,如 1984 年中国重返奥林匹克运动会、1990 年北京亚运会、2008 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体育赛事,国庆 50 周年、60 周年、70 周年庆典等重大活动中,“红都”都曾参与制作团体服装。

(据光明网 李笋/文)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国将领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和俄罗斯联邦著名军事院校,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曾派出多位优秀成员到那里学习进修。中国共产党早期派去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员有刘伯承、左权、屈武、刘云等人。

1927 年,受中共中央的委派,35 岁的刘伯承从上海登上前往苏联的轮船。他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语言和基础课程。为了能听懂苏联教官授课内容,他早起晚睡,从练发音到背单词,苦学俄语。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后来刘伯承逐渐掌握了学习外语的要诀,他还谈到“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周恩来对刘伯承有四字评价“举轻若重”,从这件小事中是能看出来的。

1928 年下半年,成绩优异的刘伯承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较为系统地学习战略、兵种战术、勤务、战史、军事地理等课程,还学习了战争哲学、国际法等。作为久经沙场的高级将领,刘伯承善于将军事理论与战例、战史结合,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为其军事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 年,刘伯承学成归来,开启新的革命征程。伏龙芝军事学院有一条标语:“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刘伯承充分理解、吸取了标语的精髓,回到国内后翻译,规范了“游击战”“指挥员”等军语,编写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等教材,与左权合作翻译《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校译了《合同战术》,为我军不断适应

战争新形势、迅速掌握新战略战术、更好打击日寇提供了有力支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伯承投身战场,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队伍,先后指挥部队进行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

左权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更早一些,他 1927 年入学,是中国共产党派去该校的第一批学员之一。在那里,左权较为系统地完成了团职、师职军事干部的知识学习,及正规战、游击战等理论学习。回国后,左权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毛主席曾夸赞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全面抗战爆发后,左权任

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开展敌后游击战。1942 年在组织反击日军大“扫荡”时壮烈殉国,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1989 年,左权与刘伯承一起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我军一些高级将领也到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学习,包括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卢东生等。他们都在不同岗位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与伏龙芝军事学院仍保持着友好往来、交流合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代又一代人继续捍卫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果实,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发展。

(摘自《环球时报》5.9 朱剑利/文)

特朗普的“三无”政策是以伊冲突的重要根源

自 6 月 13 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爆发了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的第三轮大规模冲突。双方的冲突明显升级,并存在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

特朗普 2.0 是新一轮以色列-伊朗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此轮以色列-伊朗冲突爆发前,特朗普 2.0(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的不确定性极大加剧了中东的不确定性。表面看来,新一轮以色列-伊朗冲突是双方矛盾激化的产物。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混乱和管控能力下降,构成了以色列-伊朗冲突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以色列敢于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对伊朗进行打击,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既未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约束,而且在以色列做出“先发制人”的打击后“见风使舵”,进行了默许、纵容乃至配合,背后的本质是美国中东政策缺乏道义性、全局性,领导能力、权威信誉不断下降的产物。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6 月 16 日报道,英国政府任命布莱斯·梅特雷韦利(如图)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MI6)第 18 任局长,将于今年秋季上任。梅特雷韦利将成为军情六处自 1909 年成立以来,

美国中东政策:无道、无序、无常

自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国中东政策最大的特点是无道、无序和无常。

首先是无道,主要表现为美国已放弃过去拯救中东和民主改造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而转向利益优先、侧重交易的实用主义。美国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的高度重视,对以色列的冷淡,都是美国中东外交淡化价值观、重利而无道的体现。

其次是无序,主要表现为美国的中东政策缺乏系统性、全局性、协同性的战略规划,而是带有投机性、随意性的战术应对。特朗普的中东政策除着眼于美国利益之外,既缺乏宏大的战略目标,也缺乏系统的战略安排,而是以短期利益为主的一系列投机行为。例如,美国对巴以冲突、胡塞武装、伊核问题的政策都缺乏系统性、全局性和协同性的安排,经常陷入摇摆不定、虎头蛇尾的尴尬境地。

最后是无常,主要表现为美国中东政策缺乏持久性和可持续性,通常是在通过缺乏

可信度的威慑或漫天要价受阻后始乱终弃,使美国中东政策的信用不断下降。这同样在美国对巴以冲突、胡塞武装、伊核问题的政策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既无法令以色列在加沙停火以实现其竞选承诺,更无法做到“清空加沙”转而由美国在加沙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梦想,也无法实现由埃及、约旦等巴以周边国家接收全部巴勒斯坦难民的无理要求。因此,特朗普的加沙重建计划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烂尾楼”。

在胡塞武装问题上,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先是与以色列一起对胡塞武装进行了连续的强势空中打击,但在无法令胡塞武装屈服后,便在把盟友以色列撇在一边的情况下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而胡塞武装仅仅放弃在红海对美国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以色列机场等重要目标进行打击。

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上台后先是进行“极限施压”,在不能迫使伊朗屈服后,便在缺乏与以色列协调的情况下转向



▲6月13日,以色列袭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后,消防员和民众在一处居民区清理爆炸现场

谈判。但是,在 4 月 12 日以来数轮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后,美国又突然提出伊朗核能力“清零”的要求,使谈判陷入僵局。

拢不住盟友、镇不住敌手

特朗普的“三无”政策严重削弱和侵蚀了美国中东政策的权威和信誉,既销蚀了美国对盟友的领导地位和形象,也弱化了美国对地区敌手的威胁和震慑,使美国中东政策“拢不住盟友、镇不住敌手”的尴尬处境进一步加深。

新一轮以色列-伊朗冲突加剧地区格局调整,地区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总体而言,此次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加剧了地区的不确定性。

(据澎湃新闻 刘中民/文)

英国“军情六处”首位女局长今秋上任

116 年间的首位女性负责人。

报道称,现年 47 岁的梅特雷韦利目前担任军情六处技术主管,代号“Q”,负责关键技术与创新部门。梅特雷韦利于 1999 年加入军情六处,曾在军情六处和英国国家安全局(军情五处,MI5)担任高级职务,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东和欧洲负责行动工作。

军情六处连同军情五处以及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合称为英国三大情报机构。此前,另

外两个情报机构都已经出现过由女性领导人执掌的情况。军情六处的任务是收集海外情报,以加强英国的安全,其核心目标是制止恐怖主义、破坏敌对国家的活动并加强网络安全,其局长通常被称为“c”,是该部门唯一公开露面的成员。英国《镜报》称,军情六处因作为谍战系列电影《007》中主角詹姆斯·邦德所效力的情报机构原型而备受关注。

(摘自《环球时报》6.17)

首尔低出生率状况出现转机

韩国统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经历了多年的人口下降之后,首尔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结婚和出生人数连续 12 个月出现增长。

3 月份,该市迎来 3786 名新生儿,是 3 年以来最高的月度数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7%。自去年 4 月以来,首尔一直保持着出生率的上升趋势,当时 9.7% 的同比增长首次标志着该国长期以来的低出生率状况可能出现转机。

首尔的结婚人数也在增

加。今年 3 月,3814 对新人在首尔喜结连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0%,这是连续第 12 个月出现同比增长。这种上升趋势始于 2023 年 4 月,当时结婚人数激增了 27.8%。

虽然首尔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在 2023 年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城市之一,只有 0.55,但最近结婚人数的增加推动了这一数字的上升。今年第一季度,首尔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升至 0.65,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8.3%。

首尔市政府官员将这一温

和反弹归于多种因素,包括疫情后结婚人数激增以及一系列的鼓励生育政策。

自 2023 年以来,首尔对所有不孕不育夫妇提供生育治疗补助金,不论收入高低。每次手术的补贴从 30 万韩元(约合 220 美元)到 110 万韩元不等,具体取决于治疗类型。

此外,居住在该市的孕妇有资格获得 70 万韩元的交通补贴,可用于乘坐出租车、公交车和地铁。

(摘自《参考消息》)

英国《经济学者》周刊 5 月 31 日报道,美国过去是危险时期的避风港,如今却成了全球不稳定的根源。全球金融业也遭遇“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冲击。特朗普破坏贸易,颠覆美国的全球承诺,最重要的是延长了政府的借贷狂潮,正在加速下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投资者对主导世界的美国金融业感到不安,但一个巨大的危险仍未被注意到,那就是过去十年里崛起的新型金融机构,包括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和交易机构。他们以阿波罗、贝莱德和黑石为代表,规模庞大、不透明且未经危机考验,或成为下一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投资者将突然意识到:他们正在与一个他们不认识的金融体系打交道。

新型金融机构或成下一场金融危机罪魁祸首

(据中新社讯)